

试析我国企业资金日趋紧张成因

Causes of the Shortage of China's Enterprise Funds

张 谷

(暨南大学企业管理系, 广州 510632)

企业资金紧张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因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诸资源类型之中, 最为“稀缺”的种类一直就是资金。我国有充裕的原料、土地和劳动力资源, 但在缺乏足够的资金把它们组合起来、并转换为现实的生产资料和合格的技术、生产技能之前, 它们是不堪充当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资源的。资金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中, 势必处于主动和支配的地位。这一点, 对既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又要控制货币发行和通货膨胀的我国来说, 尤其是如此。可以断言: 在我国供给机制的效率有根本性的改善、并为融资环境的宽松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之前, 企业资金紧张现象在我国不可能得到彻底消除。对此, 我们在治理之始就必须有一个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以免决策过程中产生片面和偏激的对策方案。

然而, 指出企业资金紧张现象在我国经济发展近期内不可能得到彻底消除, 并不是否定目前正在进行的企业资金紧张治理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恰恰相反,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和经济生活中, 确实存在着诸如资金运用决策、资金运行机制和资金流向结构方面的重大障碍。这些障碍因素, 成为加剧我国本来就不宽松的融资环境中企业资金日趋紧张的综合性成因。显然, 寻找到这些障碍性成因并加以治理和克服, 不仅有助于在短期内缓解我国企业资金紧张的严峻矛盾, 更有助于改善和提高我国资金使用和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益。

我国企业资金日趋紧张的成因

首先来看资金运用决策方面的障碍问题。这方面的最大问题, 依旧是资金借贷决策过程中的产权不清、政企不分, 以及投资“软约束”。产权不清、政企不分使得资金借方(企业)负盈不负亏, 企业因资金无法还本付息而被淘汰、破产几乎不会出现。同时, 又使得资金贷方(银行)同样负盈不负亏, 要实现对贷款企业的严格审核约束也不可能。前者表现

为我国相当多的国有和集体企业都有一种过热的贷款投资倾向而无视投入产出的内在倾向。资金借贷决策根本不受资金利税率和资本利润率低于银行贷款利率而形成的理性约束。后者表现为银行尚缺乏对贷款企业项目盈利性和安全性进行审慎的可行性分析及审查的利益基础。致使在贷款企业投资亏损或已经亏损、资金无法回流的情况下, 还要主动或被动地提供各种短期贷款。在实际经济运行中, 产权不清已和政企不分休戚相联。此种状况, 部分表现为有的地区政府以区域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 直接干预并强制扩大企业的投资规模。例如, 山西省某减速器厂 1993 年曾计划投资技改项目 300 万元。可当地政府却硬要企业扩大至 3 000 万元, 最后只好定为 2 200 万元, 造成企业资金紧张, 缺口太大, 导致企业被人为地拖垮。因此, 产权不清、政企不分无疑是继续引发我国企业投资决策“软约束”、投资需求“硬膨胀”的最主要的成因。它们是造成我国企业资金日趋紧张的核心因素。

其次来看资金运行机制方面的障碍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和第一方面障碍问题前后相承, 并受第一方面障碍问题的影响和支配。第一, 资金运用决策中的产权不清、政企不分, 必然引起企业间“三角债”持续产生、企业间相互拖欠贷款愈演愈烈。据人民银行调统司等部门调查: 1994 年 5 月末, 仅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应收帐净额就超 3 000 亿元, 其中不正常拖欠至少有 1 000 亿元。另据人民银行调统司对 5000 户工业企业景气监测, 仅 1994 年 9 月末应收帐款净额就达 2 677.68 亿元, 比 1993 年同期增长 129.58%, 比 1994 年年初增长 33.5%。第二, 产权不清、政企不分, 还使企业经营机制难以彻底转换, 企业生产经营和资金使用效益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相对滑坡。据人民银行调统司对 5000 户工业企业监测, 1994 年 9 月末工业产品销售率平均为 81.8%, 比 1993 年同期下跌 15.5%, 比 1994 年年初下跌 5.61%。同时, 企业流动资金周转率也逐月下降。1994 年 9 月末资金周转速度由 1993 年

同期的1.68次降为1.41次,下降16.1%。第三,产权不清、政企不分,及其内含的投资需求膨胀倾向,还一方面引起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另一方面,则加重成本推动中的需求拉动“复合型”通胀压力。据调查,被监测的5000户工业企业,1994年度固定资产在建工程迅猛增加,与1993年同期相比,7、8、9三月分别上升了52.12%、38.57%和31.38%。企业长期投资更是增长过速,与1993年同期相比,7、8、9三月分别上涨了76.38%、61.47%和60.3%。另外,全国各地生产资料价格指数1994年涨幅普遍都在两位数以上,直接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进而加剧企业资金日趋紧张。

最后来看资金流向结构方面的障碍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是前述第一、第二方面障碍问题共同交织和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企业资金运用决策中的产权不清、政企不分及资金运行机制中的经营机制涣散,通常会产生资金流向结构中的两大后果:一是投资项目预算中只考虑固定投入部分,忽视铺底流动资金。项目竣工后,只能挤占预算外的流动资金,导致资金紧张。或者,因为缺乏流动资金,项目不能正常投资,形成“只生孩子不养活”的恶果。二是投资活动过程中多钓鱼项目。工程过半,就以完不成项目为由提出增加投资,造成投资扩大,资金紧张。目前开工项目的实际投资一般均超过计划投资,有的超额达40%左右。这其中,除部分是因预算失误所致,多数都是被当作一种钓取资金的手段,超标要价,用来增发奖金、劳保福利等。又例如,产权不清、政企不分以及经营机制不完善、经营行为短期化,使得不少企业挪用生产资金,拆借银行资金,到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上去搞投机买卖。这类投机,不仅加剧了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紧张,而且带来了极其恶劣的投机方式:赚了,私人得;亏了,公家赔。据有关部门调查估算,我国企业等投资主体用于房地产、期货投机的资金有2000亿到3000亿之间。至于企业大户用于股市投机的资金,就更难统计估算了。再例如,产权不清、政企不分以及经营机制不健全、经营行为短期化,还为一些企业中少数人明拿暗挖企业生产资金、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提供了可乘之机 and 漏洞。有的投机者和投机小集团,过去和现在都是靠吃企业生产资金大锅饭、利用企业投资管道裂口“漏油”而暴富的。据笔者所知,广东某工业较发达的县级市,部分国有企业的经理就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资金擅自借给个体或私有企业,谋取个人利益。有的国有企业则将银行优惠贷给的资金,私下以高一点的利率转贷给其他非国有企业,获取利差收益。上述情况,在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治理我国企业资金紧张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引起我国企业资金日趋紧张的成因

是多方面的。企业资金日趋紧张,是我国企业产权制度和决策内部机制障碍诸症并发并趋于激化的结果。企业资金日趋紧张,与我国现时期总体发展阶段和宏观融资环境有关,但主要的成因还在于企业内部机制。我们只需算一笔小帐即可以说明。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表明:1994年1至11月全国工业生产累计增加值14466亿元,较1993年同期增长17.9%。1994年1至11月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年初增加6029亿元,较1993年同期增长21.8%;其中,1994年1至6月工业贷款约增加600亿元,较1993年同期增长100%以上。总贷款增长率和工业贷款增长率均显著地高于同期工业生产增长率。这显示出我国近年来即便在紧缩银根的呼声下,银行贷款增加量仍明显快于实物经济增长量。企业外部的融资环境总体上不是相对紧了,而是相对松了。由此提醒我们:治理企业资金紧张现象,对策重点必须放在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上。

1. 竞争性行业中的企业,应以加快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为契机,彻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投资决策软约束、投资需求硬膨胀的障碍问题。

产权不清、政企不分,一直是导致我国企业经营机制难以彻底转换,企业投资决策软约束和投资需求硬膨胀难以根治的关键原因。现在看起来,企业产权结构不变动,政企要分开是不大可能的。“是你的,不管还不行;不是你的,想管也管不了”,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与政企关系之间的联系恰如前言所述。所以,对竞争性行业的大多数国有企业来说,加快公司制、股份制向典型模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已成当务之急。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宜以嫁接外资和非国有产权为优先,国有企业交叉持股次之。原因是嫁接外资和非国有产权,能够更有效地强化企业的盈利性和资金的投入产出约束。在国有资产合理评估的前提下,嫁接外资还便于利用外资缓解国内自有资金和贷款的紧张状况。为了使公司制改造和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大范围地进行,在推行亏损或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产权出让的同时,也要有计划地选择一些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试行产权出让和外资嫁接。后者便于利用企业的名牌效应和无形资产,在产权出让和外资嫁接中达成有利的交易价格,获得较高的出让收益。后者的出让收益,一可作为国家增加自然垄断性和基础性行业的投资资金;二可作为国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来源,为亏损或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转机建制、破产兼并创造资金条件。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之后,产权不清、政企不分问题将在竞争性行业中基本解决。此类企业一方面将通过经营机制的转换和

(下转第63页)

1 850万人,产前、产后之和占农业就业的70%。美、日等发达国家正是因为有这样便捷而发达的农业辅助性服务机构的支持,即使是小农场也有很高的生产效率;而印度的家庭农场生产效率相对较低。这并不是因为其经营规模小或缺乏资源优化配置的激励机制,而是因为它们缺乏各种必须的辅助性服务。因此对我国农业来说,目前不是要不要搞规模经营的问题,而是如何搞规模经营的问题。不能一谈规模经济就只想到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如果不顾农业中现有的人地比例的状况及多数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一味追求规模的扩大,甚至借助行政手段来推动,结果必然会适得其反,不仅可能直接影响资源的生产率和农场的管理,还可能打击生产者的积极性,加剧农村的社会问题。

对今天的我国农业来说,的确需要规模经济,但规模经济更重要且切实可行的不是扩大农场规模而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具有显著规模效益的农业辅助性服务体系。它包括社会化的农业科学研究、技术推广及农民教育与培训,农产品的加工、贮藏、运输与销售,农业投入物的供应,等等。一般情况下,国有部门提供研究成果、成人教育与培训、水利建设、交通运输及通讯设施的兴建;一些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及半公共部门提供农用物资的供应、农产品的加工与销售及信贷等;私人部门提供类似于合作组织的服务并在服务质量上与之竞争。总之,

只有走“农户+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道路才有可能实现适于我国国情的规模经济效益。

走“农户+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道路就是要在保护和发挥目前农户个体经营积极性的同时,克服其局限性,使农民借助于这些服务机构有较强的抵御自然灾害,有更强的商品经营、运销产品的能力及获得市场信息的能力。这些都是迈入市场经济时农户经营所面临的最头痛的问题。过去搞计划经济,生产资料统一由集体购买,生产出来的产品也统一由社队交售。现在农民必须直接面对市场,既要管生产,又要管供应与销售,心理上和经济上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如何进一步建立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使农民更有效地组织生产,是新的经济运行体制下农业发展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要建立这样一个庞大而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应大力扶持和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家庭经营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为按劳分配找到了新的尺度,也为农村合作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只要我国能够积极有效地促成垂直一体化(vertical integration)的发展,通过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及合同制等经营方式使产供销结合、农工商一体,我国就一定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规模经营。

(责任编辑 王宏章)

(上接第45页)

优化,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另一方面,通过投资决策的硬约束,扼止投资需求的过度膨胀。

2. 自然垄断性和基础性行业中的企业,可以改革完善承包制、借鉴推行“计划合同制”作为转换国有独资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手段;同时,以适度开放非国有资金介入该类行业的生产、经营及竞争,作为促进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效率提高的补充措施,共同缓解企业资金的紧张状况。

自然垄断性和基础行业的生产,由于定价和收益通常要受到政府管制(有时,行业进入的产权类型都会受到政府规定的一定限制),因而,国有独资或国家投资将是该类行业的主要或重要产权型式。企业改革至今,表明承包制作为该类行业中国有独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尚存在许多缺陷。应借鉴法国、西欧的国有企业“计划合同制”,改进或取代现行的“承包制”。特别要改变“承包制”中承包标的过于单一、监督考核过于松散的局面,以克服该类行业中企业投资决策软约束、企业经营行为短期化的障碍因素。同时,适当开放外资和非国有资金以合资合股的形式介入该类行业的生产经营。

3. 制定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相配套的

政策措施,充分利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消除企业资金运行机制和资金流向结构方面的障碍问题。

竞争性行业中的企业公司制改造,以及自然垄断性和基础性行业中的计划合同制改革与完善,将较为彻底地消除我国企业资金运用决策中的障碍问题。但要彻底地消除企业资金运行机制和资金流向结构中的障碍问题,仍需充分利用其他相配套的政策措施。例如,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过程和转换结束之后,都需要积极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特别是前两者),坚决清理企业间的贷款拖欠,盘活存量资金,使之向经营效益好的企业倾斜分配。在继续保持现行银根紧缩程度的前提下,应制定有关限制企业生产资金流向股票、期货、房地产市场的反投机性贷款、税收政策。另外,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过程和转换之后,还需切实确定好政府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合理角色及功能。机制转换过程未完成之前,政府主管部门仍必须对企业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及其铺底流动资金的配套加以指导和检查。机制转换过程和转换之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都必须加强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监督检查,防止国有资产人为流失,防止生产资金转化为消费资金。

(责任编辑 刘先曙)